

一 从十月革命到中苏建交

1. 震撼世界的“阿芙乐尔”号炮声 与彼得格勒的中苏外交接触

1917年11月7日，在俄罗斯，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轰击沙皇冬宫的隆隆炮声中，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政权——苏维埃政府诞生了。因为这一天是俄历的10月25日，所以就称之为“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是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在一个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干成的，对整个世界和俄罗斯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当时更是“震撼了世界”，有的国家政权对之仇视，欲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有些国家则产生疑惑：在资本主义之外又新生了一个

社会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将并存两种制度？

新生的苏俄政权于 11 月 8 日通过了划时代的《和平法令》，宣布废除秘密外交，实行新的对外政策，愿和所有不同制度的国家平等共处；但国际社会没有立即接受。当时在苏俄首都彼得格勒的各国使节采取了“不承认”、“不接触”的对策。为时不久，“二不”又转向了“非正式交际”。这是由英国大使于 1917 年 11 月 17 日再次召集各国使节一起议定的，缘由是苏俄政权已在运作，但是否持久难以预料，而苏俄的主动外交又使各国与苏俄随时有不可避免的往来，不能不采取一个权宜办法。于是，便开始各自以私人资格与苏俄政府进行秘密接触。到 1918 年初，各国公使几乎都因种种“必要”的缘由派官员与苏俄政府进行了秘密接洽。中国公使也在其中。中苏两国最早的外交接触就是这样开始的。

俄国是中国的邻邦。沙俄统治时期俄国施行的侵略政策，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危害，无疑是对中国独立生存的一大威胁。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实行的是新的对外政策，它明确宣布废除旧俄时期的不平等条约，并于 1917 年 11 月至 1918 年 1 月陆续公布了旧俄外交部档案中的 100 多件秘密条约、

协定及其他未曾公布的外交资料；同时呼吁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行动在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德、奥、保、土等国很快于 1917 年 12 月中同苏俄签订了为期 28 天的停战协定，并于 12 月下旬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今布列斯特）正式举行和平会议。新生的苏俄需要有利的外部环境，需要漫长的中苏边界保持安宁和谐，因而中国这个最大的邻国也从一开始就是苏俄外交的积极工作对象之一。而当时由北洋军阀执掌的中国北京政府基于自身的状况和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还不可能做出惊人之举，它只是随着国际潮流，在观望之中亦步亦趋地行动着。

1918 年 1 月 19 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司司长伏时涅新斯基与中国使馆秘书李世中作首次私人晤谈。这是十月革命后中苏外交官员之间的第一次非正式接洽，是苏方主动约见的。晤谈中，苏方明确提出派代表来华，并表示在驱逐驻华旧俄官员的前提下，可以考虑放弃俄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和退还租界问题。当晚，中国公使刘镜人向北京作了汇报，并援引苏、英外交官员已在伦敦会晤之例，请示北京准许伏时涅新斯基来华，与苏俄作事实上的往来。北京没有允准。

5 天以后，李世中奉命答访，会晤了伏时涅新斯基和苏俄副外交人员委员波里瓦诺甫。谈话长达 5 个小时，涉及范围甚为广泛：举凡中东铁路情势、外蒙古问题、旧俄驻华公使和中东路旧俄局长的在华地位、苏俄的对日政策和对华政策等等，并逐条加以讨论。这无疑是中苏两国外交官员之间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是中苏外交接触的重要开端。虽然北京政府囿于国际环境，不愿行动“独异”，没有答应立即同苏维埃政府就调整两国关系进行谈判，但通过中国使馆这个途径，还是达到了苏方的一个预期目的：将苏维埃政府的各项政策转达中国政府。

但是，新生苏俄的国内局势和国际环境又发生了激烈变化。几经休会的苏德和谈破裂，苏德战线的军事行动恢复。2 月 18 日下午，德军开始全线进攻，数日之内占领了一系列城市，形成了对苏俄首都彼得格勒的威胁。为免受袭击，2 月 23 日，中国公使与其他各国使节一同撤离彼得格勒。

3 月 3 日，审时度势后的苏俄同德、奥、保、土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签署了和约。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后，苏俄退出了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准备着手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和平

建设。但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又开始了新的行动。3月15日，协约国集团政府首脑和外长在伦敦举行会议，宣布了不承认布列斯特和约，并决定立即对苏俄进行公开、直接的武装干涉。于是，从1918年春天开始，新生的苏俄又不得不全力以赴进行一场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殊死斗争。这场斗争持续了3年。

这样，开始于苏俄首都的中苏最初外交官员之间的直接接触便中断了。但是，苏俄的主动对华外交没有停止。在1918年3月11日迁都莫斯科后不久，苏方再次提出派代表来华的要求，仍遭拒绝。然而，北京政府同时又命令沿边各官员遇事时“不妨”与掌握实权的苏俄官员作非正式接洽，以便解决贸易和侨民问题。显然，这是因为两国大片领土接壤，互有侨务和商务往来，双方接触必然不可缺少。正是这种无法回避的现实促使观望中的北京政府面对已然存在着的苏俄采取了种种“实际”的做法，致使在苏俄政权建立之初就产生的中苏接触得以保持和发展，并使日后中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也有了可能。

与其他国家同苏联的关系相比，中苏关系别具特色。这就是：中苏人民之间的友谊源远流

流长，川流不息。

中苏两国山水相连，交往久远。从 19 世纪末开始，一批批的华工陆续到达俄国，他们在那里生存、繁衍，累计达几十万，和俄国人民一起为那里的发展建设付出了自己的辛劳、血汗和智慧。十月革命的发生又把他们中的许多人吸收到苏俄新政权的队伍中，据不完全统计，1917~1920 年间有 4 万多名华工战士在苏俄的广大国土上和广大苏俄人民一起浴血奋战，直接参加了创立和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与此同时，大批华工回国，又把十月革命的见闻、影响带到中国。

在中国国内，人们早在苏俄新政权诞生之初就迅速得到了消息，一直关注着它。

1917 年 11 月 10 日，十月革命发生的第四天，中国四家报纸——上海（民国日报）、北京（晨钟报）、上海《时报》和《申报》同时刊载了来自路透社的四条电讯，率先向中国民众报道了俄国政局的最新消息：布尔什维克推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召开了第二次全俄兵工代表大会，并提出了新的革命措施：停战和谈，分土地予农民。紧接着，武汉、广州、天津等各大城市的报纸也连续不断地进行跟踪报道。在不长的时间里，俄

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信息便广泛、迅速地在中国各地传遍。

十月革命是划时代的新式革命，它的胜利明确宣告：在全世界 1/6 的土地上结束了旧的统治制度。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以及由此开始的世界新时代、新潮流，自然使已经发生了辛亥革命、正在争取民族独立与民主政治的中国广大民众、社会各阶层、各党派、各思潮流派对之予以特别关注。任何消息，无论褒贬，都以先闻为快。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的报道也从一般性的介绍走向深入和系统。

先进的知识分子把从苏、英、美、法、日、德等国书报杂志上了解到的苏俄情况陆续介绍给中国广大民众的同时，也通过这些错综纷乱的消息报道探求和认识十月革命的真相和苏维埃俄国的情况。其他许多人士也从各自的角度加入了思考和研究苏维埃俄国和社会主义的行列。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 1918 年 7 月至 1919 年 1 月的半年时间里，连续发表了 4 篇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和《新纪元》，阐述了十月革命

的性质及伟大意义，率先公开表达了对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的欢呼和热情讴歌。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则于 1918 年夏直接致电苏俄政府和列宁，庆贺他们的成功，对他们“艰苦卓绝之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

与此同时，从 1918 年下半年开始，许多有影响的报刊杂志上陆续出现了一系列关于苏俄政府各项政策的介绍，关于苏俄革命与建设情况和关于苏俄国情状况的报道，党、政、法、民、农、工、财、经、文、教、妇、卫，无所不包、面面俱到。

据有关统计，在 1919 年“五四”前后出版发行的有一定影响的 153 种期刊中，就有 65 种期刊刊载过有关苏维埃俄国的研究论文、评论、人物传记、游记和文学作品，总计达 835 篇。

这大量的宣传报道、强大的传播潮流贯穿于苏俄国内战争和反武装干涉的整个时期，对于鼓舞中国人民支援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反对武装干涉苏俄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本身也是对艰苦奋斗中的苏俄人民的道义支持。

1918 年春，出兵干涉苏俄的日本，以“履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义务”为借口，

诱迫当时的段祺瑞政府于 1918 年 5 月 16 日签署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日本企图以“共同防敌”为名假道中东铁路长驱直入苏俄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并乘机侵占中国东北，同时胁迫中国军队充当它干涉苏俄的炮灰。这一举动，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从东京到北京、到上海、到广州，留日学生、国内各界纷纷集会、请愿，反对与日订约。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还特意将其反对“中日密约”的声明转交于苏俄。中国人民这些正义的声音和举动，是奋起救国的爱国行动，也是对苏俄的有力声援，使处于国内外敌人重重包围之中的苏俄深受鼓舞。

1918 年 4 月 5 日，日本陆战队在俄远东港口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大批日军则经安奉线从中东铁路进入西伯利亚。中东铁路成为外国武装干涉军最重要的军事运输长廊，大批军队和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往武装干涉苏俄的东方战线。1918 年春至 1920 年春，中东铁路的中俄工人多次掀起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切断了帝国主义干涉军的这条军事运输线，并打击了此间的帝俄余孽和白卫军，从而减轻了苏俄东方战线上的压力。

不久，战乱中的苏俄人民在 1921 年又遇

上特大旱灾，迫不得已向世界求援，并不富裕且连年荒旱的中国人民毅然给予了深切的道义同情和无私的物质援助，从普通百姓、知名人士到上台总统都加入了赈济俄国旱灾的行列。苏俄政府在多次感谢之余特别指出：各国赈俄均有条件，惟中国一无所求。

这一切，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自然沟通，为后来中苏邦交的建立和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增添了良好的气氛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震动中国朝野的苏俄对华宣言与张斯麇使团访苏

苏俄的对华外交是主动的。随着苏维埃政权的日益巩固和其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苏俄对华政策也不断展开。1919年夏，苏俄红军击溃了反对苏维埃的高尔察克部队，解放了乌拉尔，把白卫军和外国武装干涉者赶出了西伯利亚。这一胜利为苏俄同中国建立直接联系创造了条件。苏俄政府清楚地知道：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可以扩大苏维埃共和国的对外联系和加强苏俄的国际地位，因而及时制定了全面的对华政策。7月25日，苏俄政府向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

和国人民委员会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宣言》，史称“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

宣言在通报了苏俄取得反武装干涉初步胜利的情况后，列举了苏俄政府向中国政府所作过的主动姿态，又表示了苏俄对华新的友好承诺。最后明确指出：

如果中国人民愿意像俄国人民一样获得自由，愿意摆脱协约国在凡尔赛给中国人民安排的命运……那就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他们惟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工农红军。

苏维埃政府通过中国人民的政府向中国人民建议，立即与我们建立正式关系，并派遣自己的代表与我们会晤。

此宣言明确而清楚地表达了苏俄对华外交政策的原则：俄国人民极愿援助中国人民摆脱在巴黎和会上的屈辱命运，愿与中国订立平等的新条约，取消帝俄时代的一切特权，放弃庚子赔款，希望中国立即派出代表进行谈判。

1919年7月25日，是在凡尔赛和约签字日6月28日后还不满一个月。

巴黎和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战胜国聚集巴黎召开的战后“和平会议”，从1919年1月开始，前后拖了半年时间。这也正值各帝国主义国家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的高潮之中，而和会又没有邀请苏俄代表参加。所以，和会的结果将会形成怎样的世界新格局，正在为生存而艰苦奋斗的苏俄可能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这一切都使苏维埃政府非常关注巴黎和会的动向及与会各国的情况。

据苏联国家档案记载，1919年5月3日，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泽荣和乌克兰分会会长朱绍阳曾向列宁建议：派华工联合会代表团回中国去，并希望有一名苏俄政府的全权代表参加。他们认为，目前中国形势对于派遣苏维埃代表前去中国，特别有利。他们坚信：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当前不会不同意与苏俄建立联系。

十分清楚：1919年5月3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受到的屈辱待遇已经确定。和会给予中国的，只是归还八国联军入京时被德国夺去的天文仪器而已。消息传出，激起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引发了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并扩展到全国。海外华侨也纷纷行动，要求拒签和约。在巨大的压力下，

中国政府代表没有出席 6 月 28 日的巴黎和约签字仪式。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行动向世界表明：要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联合压迫，争取民族自由。

当此之际，苏俄及时制定了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宣言，呼吁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加快两国政府外交接触的步骤。显然，这份对华宣言是苏俄全面对华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同时也是一份具有宣传性质的重要文件。

然而，1919 年 7 月 25 日的这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宣言》，在它制定和发表后并没有立即在中国产生反响。因为它虽然公开刊载于 1919 年 8 月 26 日的苏俄《消息报》和《真理报》，却没有及时送达中国政府，也没有完整地传播到中国民间。消息灵通的上海报人曾于 1919 年 9 月间在报纸上作过报道，但属于“一鳞半爪”，没有引起如当初十月革命爆发时那样的震动和反应。

此时，外国武装干涉军又发动了一次对苏俄的联合进攻。

进入 1920 年春，苏俄及其东线形势急转直下。随着苏维埃政权的敌人高尔察克军的崩溃，美、英、法干涉军纷纷撤退，协约国最高

委员会也于 1920 年 1 月中旬宣布取消对苏俄的经济封锁。英国更率先向苏俄伸出外交触角，开始于 1919 年底的英苏直接对话，进而拉开了英苏贸易谈判的序幕。“每依列强为转移”的中国北洋政府，曾于 1918 年 8 月 22 日发表《出兵海参崴宣言》，并于其后陆续派遣军队进入俄境，共计一混成旅团，参加了西伯利亚境内美、日、英、法干涉军的一些联合行动。这时，再次“与各国取一致行动”，于 1920 年 2 月中旬宣布从海参崴撤兵。日本干涉军也被迫开始后撤。

这一切，使远东地区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更加有利于苏俄。敏于行动的苏俄立即向各国开展新的外交活动，外交触角也再一次伸向中国。

1920 年 3 月 3 日，奉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之命抄送苏俄 1919 年对华宣言给中国外交部门的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全权代表杨松，在照会中十分明确地说：苏维埃军队正胜利地向东方推进，因此苏中两国政府有必要建立明确的关系，并请中国政府将宣言内容告知全中国人民。于是，苏俄代表们于远东通过广播、登报、拍电、派员、转递等各种渠道终于将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在其制定 8 个月后正式完整地

传到中国。

中国朝野各界，立即为之所感动。

经过五四革命浪潮洗礼的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无比的欢悦和激动，热烈地迎接庆贺它。据统计，全国 30 多个重要社会团体和国会议员都通电苏俄表示衷心感谢；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发表评论，称誉苏俄“义举”，众口一声地主张中苏友好，并要求北京政府答复苏俄的宣言，响应苏俄的建议。

与此同时，苏俄派出了党、政两方面的代表来到中国，广泛接触北京政府政界人物，宣传苏俄对华宣言精神。他们还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以及哈尔滨等地觅寻和联络开明人士、先进分子、革命志士，向他们宣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及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中苏关系的建立。

北京政府外交部正式收到上述（宣言）之后，即将译件抄送国务院和参众两院，并分发各部；又于 4 月 1 日电告有关驻外使节：对苏外交先进行非正式接触。4 月 8 日，北京政府召开国务会议，对苏俄宣言中的要点逐条核议后决定：由外交部密派官员赴海参崴与苏俄政府作非正式接洽。

此时，苏俄已与爱沙尼亚签订和约建交，

并和英国开始进行贸易谈判，从而在打破经济封锁之后，又开始摆脱外交上的孤立处境，国际地位有了改变。

不久，各国为解决对俄事务，分别派代表在丹麦与苏俄政府代表接洽，北京也派了代表，并及时获知了各国对俄态度已有新动向。

面对此景，原先观望、担心苏俄政权是否巩固的北京政府审时度势，认为：新党将来必占优胜，旧党万难复振；英法美已有接待苏俄代表的先例，美国还曾暗中派员赴俄调查。所以，为避免落在他国之后，中国应重订对俄方针，应接近新党，但不过于接近。于是采取了新的步骤：于 1920 年 6 月派外籍顾问辛博森等 3 人到西伯利亚视察，又派督办边防事务处官员张斯麇率代表团赴苏考察。但明文指示张斯麇：遇事只能相机作非正式之接洽。虽然北京政府仍是观望、探听虚实，但这毕竟是中国政府对苏关系的主动接近，是中苏交往中的一个突破性行动，因此，苏俄政府非常重视。

张斯麇一行于 9 月 5 日抵达莫斯科后受到了超规格的热情接待。苏俄政府以接待全权代表团的规格接待了尚无全权的张斯麇代表团，列宁、苏俄政府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分别多次接见了张斯麇。这样，张斯麇使团就肩

负着中苏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愿望：北京政府希望了解苏俄局势及其稳固的程度，命使团与苏俄政府就与两国愿望有关的问题进行交涉并探索以苏俄宣言为基础进行非正式谈判的途径；苏俄政府则最大限度地利用使团赴苏之机直接阐明苏俄对华政策，争取就建立两国友好关系达成协议。

在谈判中，苏俄政府主动表示：希望在莫斯科有中国的常驻代表，以便于两国间的各种联系。10月12日，张斯麇知照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称，中国将向莫斯科、伊尔库次克、鄂木斯克派任总领事，苏方欣然应允。

张斯麇使团的访苏沟通了直接对话的渠道，增进了中苏两国的联系和了解。

随着中苏接触的步步深入，如何处置旧俄驻华公使的问题也提到了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

本来，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旧俄公使不服从新政权就应停止公务了。但囿于当时国际环境的中国北洋政府认为不必积极地与旧党断绝关系，也不想主动承认苏俄，而是期望它们自动变换，以示“中立”。因此，在实际上容许了旧俄驻华使领在中国相当长时间的存在。但在十月革命后，旧俄使领实际上已逐渐